图书情报工作
第 66 卷 第 20 期 2022 年 10 月

参与智库活动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的影响探析*

申静 陈晓龙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目的/意义]中国图情学者是智库研究的主力军，探析参与智库活动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的影响，对于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采用描述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多期双重差分法，探析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形式主要有任职学会委员、智库兼职、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参与政府决策和参与智库发展论坛。其中，除了参与智库发展论坛，前两类形式的参与人数最多；智库兼职和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提高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智库兼职可以显著增强其学术成果合作，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提升其学术成果质量；参与智库活动对中年组学者的学术成果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智库活动 学术成果 中国图情学者 产学研 多期双重差分法
分类号：G251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2.20.007

1 引言

智库是针对国内外事务进行政策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以帮助决策者或公众做出决策的研究机构[1]。随着公共政策的多元化、复杂化、科学化与民主化程度不断提升，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大了决策错误的风险成本[2]，因此，智库作为现代政府治理与决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渐获得全社会的关注。自 2012 年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这一要求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3]，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人才队伍建设。随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的相继颁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并推动我国智库快速发展。2021 年我国智库数量达到 1 413 家，仅次于美国的 2 203 家，居于世界智库数量第 2 位，但无一跻身于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榜单前 10 位[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任重道远。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图书情报（以下简称“图情”）领域的专家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研究智库最早也是最活跃的群体之一[4-5]，而图情机构在智库运作中起到了前端基础性作用[6]，并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信息分析人才[7]。因此，笔者探析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的影响，旨在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我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人才队伍建设。

2 文献回顾

2.1 智库活动与学术成果

智库活动是以智库专家学者为主要参与者，围绕研究议题运用专业知识和分析能力影响政企的决策过程，涉及政府、业界、学界、公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国内外研究主要从智库的服务主体或服务对象探讨智库活动的形式，如组织召开研讨会、开展项目研究是智库的常见活动形式[8]；凭借专业知识参与政策制定是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主要表现[9]，如美国智库开发的“旋转门系统”[10]；任职图书馆学会是参与智库活动的一种服务策略[11]。鉴于智库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本研究以参与“发挥了智库功能”的各种咨询研究活动界定为中国图情学者参与了智库活动。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创新驱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知识服务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ATQ00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申静，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jshen@pku.edu.cn；陈晓龙，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2-07-29 修回日期：2022-08-18 本文起止页码：62-72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学术成果是指科研人员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中,通过研究、分析、实验等一系列活动手段,所取得的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技术水平、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结果[12],也称为"科研成果""研究成果"。如我国教育部为了破除高校哲社科学研究评价中的"唯论文"不良导向,认为新时代的研究成果是指学者付出劳动进行系统学术研究后生成的论文、著作、决策咨询报告等代表性成果[13];曾文通过调研美国6份数字学术评价指南,认为应该将数字期刊、数据库、网站、博客等数字学术成果与传统的印刷论文一起视作学术成果[14]。

实证研究中大多数采用期刊论文代表学术成果,并用论文数量、期刊质量和合作者人数分别代表学术成果的数量、质量与合作。如姚乐野等把学术成果限定为期刊论文,从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获取论文数量、来源期刊、国际合作等数据测评高校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15];严炜炜等应用时间序列聚类法分析,发现来源期刊年代近、刊物质量好、作者合作意愿强是学术社交网络中 iSchool 高影响力科研成果的共有特点[16]。学者们还研究了性别和科研环境等因素对学术成果产出或学术合作的影响作用。如张琳等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从性别视角探讨政策资助对论文成果产出的影响,发现女性项目负责人的论文合著规模更大、国际化程度更高;男性项目负责人论文成果的学术影响力更高,且相较于社交网络在 Mendeley 学术软件上的受众更多[17];M. Zhang 等对"985 高校"化学家的期刊发文进行计量和回归分析发现,相较于男性科学家,女性科学家通过国际合作显著提高了其学术成果产出[18];H. T. Truong 等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PLS-SEM),结合方差分析和 t 检验发现,科研资源、教师政策、科研活动支持、高校科研目标、领导力对教师的科研产出有重要影响[19]。

智库是政治、学术、媒体和企业的混合体[20],是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交叉领域的一种独特组织类型[21]。因此,参与智库活动会产生文章、报告等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通常是面向决策者的政策研究成果,大多刊发在受决策者青睐的出版物上,但决策者却很少有时间或意愿去阅读这些长篇论文或报告,由此引发了社会对智库研究人员的专业规范和成果质量的讨论[22],即参与智库活动会影响学者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而 E. Planells-Artigo 等对 1985－2019 年间的 2 162 项智库研究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参与智库活动的不同领域学者通过共同努力可以解决社会问题[23],说明智库活动的跨领域合作会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综上,本文的学术成果包括学术成果的产出与合作,其中,学术成果产出包括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学术成果数量可以量化为中国图情学者在中文期刊上的发文总量,学术成果质量可以量化为在选定的核心期刊和专业期刊上的发文总量,学术成果合作可以量化为在选定期刊发文的累计合作者人数。

2.2 产学研合作对学术成果的影响

产学研合作是指产业界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双方或三方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形成的合作交流关系[24]。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产学研合作对学术成果产出有积极影响,如 B. Van Looy 等对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 14 个研发部门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学者参与产学研合作能够提升其知名度,带来研究资源的"马太效应",增加其学术成果产出[25]。但 G. Buenstorf 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普朗克研究所学者 20 年间的学术成果数据和创业活动经历,发现产学研合作对其学术成果产出有消极的影响[26]。

智库活动涉及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市场等多方利益主体[27],是一种产学研合作形式。近期有学者开始关注参与智库活动对学者学术成果的影响,如宋鹭等通过剖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成果产出机制,认为高影响力智库对其成果的学术标准要求可以提升学者的学术规范,从而提高了学者的学术成果产出[28];但高浩然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例,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的影响并不显著[29]。

综上,智库活动是一种产学研合作形式,参与智库活动会对学者的学术成果产生影响。中国图情学者是中国智库研究的主力军,探析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的影响,可以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智库成果产出机制,并为产学研合作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大量的资金、数据等学术资源的投入可以提高科研成果的数量[30],参与产学研活动获得的学术资源、社会地位等可以提升学者的学术成果产出[25]。智库活动作为一种产学研活动,学者参与其中可以掌握更多的科研与社会资源,承担更多的科研课题,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等[31]。而智库为了给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重要的见解,在研究全球发展、收集和分析信息方面一直站在前沿[32],所以学者在智库兼职可以获

得政府的重要数据[33]。可见,参与智库活动可以使学者获得大量的学术资源,从而支持和激励其提高学术成果的数量。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参与智库活动可以提高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

智库为了凭借高质量的成果维护其可信度和影响力,一定会制定严格的成果标准和引入主管部门对其成果质量进行有效控制[20,34]。如智库报告的内容和质量由上级或同事检查,并送交该领域的专家提出意见[21];建立智库的可信度策略已经从基于感知的可信度概念(如网络、可见性、过去的影响等)转向基于更严格的研究质量评估概念[35]。可见,参与智库活动可以提高学者学术研究的质量意识,从而提升其学术成果的质量。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2:参与智库活动可以提升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质量。

在各种学术委员会任职及学术活动可以使学者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并享有一定的学术权力[36],从而增强其学术合作。学术任职权力会使学者吸引更多新的合作对象,增强其学术合作的能力[37];通过"旋转门"任职政府部门的学者加强了与政府职员的人脉关系,扩大了其合作网络[38];会议、论坛等学术活动会增强学者的学术合作[39];持久的学术交往关系,特别是对重要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有利于促成学者的学术合作[40]。智库作为专业知识和创新思想的熔炉,通常采用引入访问学者、工作小组等方式,推动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参与智库的研究项目[41]。可见,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可以促进其与智库专家的广泛交流,增强其学术合作。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3:参与智库活动可以增强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合作。

3.2 样本与数据

为了研究某一学科的活跃学者,学界通常对该学科领域核心期刊的论文数据进行计量以确定不同时期的活跃学者。如 D. Zhao 等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下载 1996－2005 年间 12 种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 IS)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据,计量学者发文数和被引次数,确定出 120 个 IS 高被引作者[42];邱均平等采用核心期刊高发文量和 h 指数结合的方法,通过 CSSCI 获取 20 种图情领域核心期刊上的第一作者发文量,统计出图情领域近 30 年的 187 位高影响力作者[43]。由于学者的学术活跃度及高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其科研生产力,而科研生产力对学术创业有积极影响[44],所以,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活跃度及影响力越高,其参与智库活动的积极性就会越高。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图情学者的活跃度及影响力来确定研究样本。为了减少学者学术年龄累积带来的发文量差距,本研究将时间窗口限定在近 10 年,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在中国引文数据库(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中检索 2011－2020 年间 23 种图情领域期刊(称为选定期刊)的文献,其中,18 种期刊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收录,5 种期刊为图情领域智库专业期刊,如表 1 所示:

表 1 图情领域的核心期刊和智库专业期刊

图情领域核心期刊		智库专业期刊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图书情报工作	情报科学	智库理论与实践
情报学报	图书馆建设	科技情报研究
大学图书馆学报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情报工程
图书馆杂志	图书情报知识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情报理论与实践	
国家图书馆学刊	情报杂志	
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与情报	
图书馆论坛	情报资料工作	

首先,笔者选取在核心期刊和专业期刊上发文量及被引量分别排名前 1 000 名的学者,通过数据清洗获得学者发文量及被引量的总排名,通过消歧排除同名作者后,将发文量排名前 120 名和被引量前 120 名[42]的学者作为初始样本,去重后确定了 163 位学者。然后,通过这 163 位图情学者所在单位的官方网站、学者个人网站、Research Gate、LinkedIn、期刊发文中的作者简介等多个渠道,全面获取学者的履历信息,包括教育背景、参与的智库活动等。最后,根据学者排名及信息获取的完整度,筛选出 100 位学者纳入最终研究样本。

确定最终研究样本之后,笔者依据"核心期刊名称＋专业期刊名称＋作者"构造检索式,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专业检索功能获取这 100 位图情学者在选定期刊上发表的 11 296 篇论文,采用 VBA、Python 代码提取论文的发表时间、合作者信息、智库兼职数量等,将其构造为面板数据。同时,通过中国知网的学者发文统计,统计每位学者在中文期刊的发文量。

3.3 变量选取

3.3.1 因变量

本研究通过学术成果的产出和合作反映学者的学

术成果,其中,学术成果产出包括数量和质量,学术成果数量为中国图情学者在知网收录的全部中文期刊发文量,质量为其在23种选定期刊上的发文量;学术成果合作为其在选定期刊上发文的合作者人数,即截至某一年份,学者在23种选定期刊发文的去重合作者数量,计量单位为人数而非人次。如表2所示,中国活跃图情学者10年间的学术成果数量人均为148篇,人均一年发文14篇;八成以上的文章发表在选定期刊上,10年间人均在选定期刊上发文122篇,人均与72位学者进行过学术成果合作。可见,中国活跃图情学者学术成果数量较多,且倾向于在选定期刊上发文,学术成果合作性较强。

3.3.2 自变量

参与智库活动的形式和频次可以反映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情况,因此,本研究以参与发挥智库功能的各类咨询研究活动界定为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形式,频次为学者参与各类智库活动形式的数量。如表2所示,中国图情活跃学者平均任职2项学会委员和1项智库兼职,很少参与其他形式的智库活动。虽然参与智库发展论坛是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主要形式,但由于论坛数量众多且数据可溯性低,难以获取,因此不在本研究实证之列。

表2 变量描述及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学术成果数量/篇	148.53	82.733	35	541
	学术成果质量/篇	122.14	68.133	29	446
	学术成果合作/人数	72.19	31.797	13	178
自变量	任职学会委员/个	2.27	2.145	0	10
	智库兼职/个	1.13	1.323	0	6
	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个	0.31	0.581	0	2
	参与政府决策/个	0.30	0.689	0	4
	参与智库发展论坛	–	–	–	–
控制变量	性别/女性	0.16	0.368	0	1
	学术年龄/岁	29.46	9.041	10	52
	组织支持度/个	9.02	5.453	1	19

3.3.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含个人和组织两个方面。个人方面包括学者的性别和学术年龄,因为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45],而学术年龄带来的经验、资源及马太效应对学者的学术成果和资源获取有着显著影响[25]。学术年龄一般是指学者从事某一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始到结束的时长,有学者以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时间[46]或博士毕业年份[29]为学术年龄起点。由于本研究样本的大多数学者在本科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且所处的学习年代,学位授予制度尚未规范,很多学者在攻读博士之前已有多年的学术活动,因此本研究的学术年龄是指学者从本科毕业当年起至今的时间跨度。因为高校可以给学者提供更多的资金、研究生等各种科研支持,从而提高其研究生产力[47]。所以,本研究以学者所在单位具有智库功能的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院和研究所的数量表示其组织对学者学术成果的支持度。如表2所示,本研究样本中有16位女性学者,学者的平均学术年龄为29岁,组织支持度均值为9。可见,中国活跃图情学者中男性占比在八成以上,与V. Larivière等发现的学术活动中男女比例失衡一致[48]。

3.4 模型建立

根据3.3选取的变量,笔者提出模型Ⅰ来探析中国图情学者参与不同形式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的影响:

$$P_i = \beta_0 + \beta_j T_j + \beta_5 F + \beta_6 A + \beta_7 S + \varepsilon \qquad \text{模型 I}$$

其中,因变量 $P_i(i \in [1,3])$ 为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的数量、质量与合作,$T_j(j \in [1,4])$ 为不同形式的智库活动,F、A、S 为控制变量,分别代表性别、学术年龄、组织支持度,$\beta_k(k \in [0,7])$ 为回归系数。

双重差分法是应用面板数据查看政策或事件冲击带来影响的常用方法[49],而多期双重差分法适用于处理样本受政策影响时间不一致的情况[50]。智库兼职对学者学术成果的质量和合作影响较大,且学者兼职智库的数量及时间的可溯性强,因此,本研究将中国图情学者"首次参与智库兼职"的时间视为其受政策影响的时间,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析中国图情学者兼职智库对其学术成果质量和合作的影响。本研究将中国图情学者在23种选定期刊上的发文数量及时间,以及智库兼职的数量及时间构造为面板数据,并引入个体和时间的双重固定效应,提出模型Ⅱ来探析智库兼职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质量与合作的影响:

$$y_{it} = \beta_0 + \beta_1 * treat_i * post_{i,(t-s)} + \alpha_t + \gamma_i + \varepsilon_{it}$$
$$= \beta_0 + \beta_1 C_{i,(t-s)} + \alpha_t + \gam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s \in [0,3] \qquad \text{模型 II}$$

其中,y_{it} 可以表示:①中国图情学者 i 截至 t 年年底在选定期刊上累计发文量;②学者学术成果合作者人数加权后的发文量,即 $y_{it} = \sum_{j=1}^{m_{it}} \frac{1}{N_j}$,其中,$m_{it}$ 表示学者 i 截至 t 年年底在选定期刊上的发文总量,N_j 表示学者发表的第 j 篇文章的作者数量;③中国图情学者 i 截至 t 年年底的学术成果合作者人数。$treat_i$ 表示学者是否兼职智库,如果兼职则为兼职智库的数量,若无兼职

则为0。$post_{i,(t-s)}$ 表示学者 i 智库兼职的时间虚拟变量，兼职前为 0，兼职后为 1。使用一个变量表示该交互项，即 $C_{i,(t-s)}$ 表示中国图情学者 i 截至（t-s）年年底累计的兼职智库数量，交互项系数 β_1 是处理效应。考虑到学者发表期刊论文时，从选题到研究、文稿撰写、期刊录用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因此用 $C_{i,(t-s)}$ 表示智库兼职的滞后影响，即 s 取 1－3 时，表示智库兼职对其后 1－3 年的学术成果影响。时间固定效应项 α_t 表示控制不同年份形势、环境变化等对学者的影响。个体固定效应项 γ_i 表示控制个体特征（如个人能力、性格）对学者的学术成果影响。可见，该模型可以测度同一个学者在不同时间兼职智库的不同状态，能够以参数化形式评估智库兼职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质量和合作的影响。

另外，图 1 检验了中国图情学者在选定期刊发文量、合作者加权发文量和合作者人数的平行趋势。其中，实线为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虚线表示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合作者人数为 99%，其余为 95%）。可见，学者首次智库兼职的前 5 年，各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每年的回归系数均与 0 无显著差异，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实施干预之前没有明显的差别，具有相同的趋势，表明本研究数据满足平行趋势的假设，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分析结果具有可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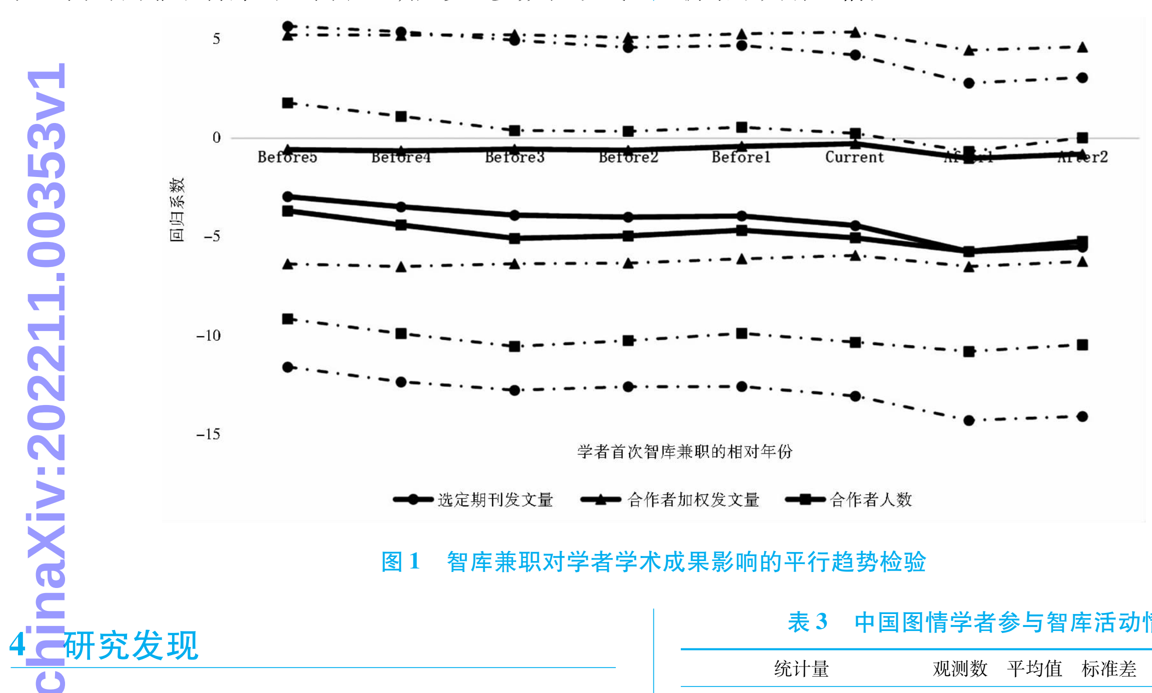


图 1　智库兼职对学者学术成果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4　研究发现

4.1　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形式

根据本研究对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界定，笔者调研学者履历发现中国活跃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形式主要有 5 类：①任职学会委员，推动科研成果进入决策工作程序；②智库兼职，开展具有前瞻性与可行性的政策研究；③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发挥专家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④参与政府决策，利用专业领域特长，助力政策制定；⑤参与智库发展论坛，增进交流合作，凝聚共识。调研还发现，样本中有 84% 的中国图情学者曾经参与过至少一类形式的智库活动，且这些学者平均在 2 类不同智库活动中参与了 4 种智库活动；近六成的学者具有智库兼职的经历，且平均兼职 2 个智库（见表 3）。

图 2 中的圆圈大小代表参与各类智库活动的中国图情学者数量多少。无论是从参与各类智库活动的人

表 3　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情况

统计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参与智库活动的学者数量/人	100	0.84	0.37	0	1
参与智库活动的形式/类	84	2.10	0.87	1	4
参与智库活动的数量/种	84	4.77	2.88	1	13
参与智库兼职的学者数量/人	100	0.59	0.49	0	1
学者兼职智库的数量/个	59	1.92	1.21	1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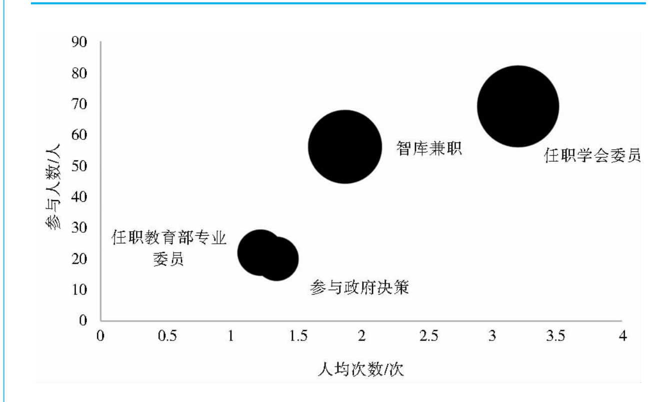


图 2　参与各类智库活动的中国图情学者数量及人均次数

数,还是从参与各类智库活动的人均次数来看,任职学会委员和智库兼职是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最多的智库活动形式。可见,深入政府部门进行“内参”的学者数量较少,说明中国图情学者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比较少,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决策咨询作用。

此外,调研发现中国图情学者主要在高校智库兼职(见图3),较少在党政智库兼职。其中,在高校智库A兼职的图情学者最多,说明该中心的产学研合作较强且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但有一半的智库,每个智库兼职的图情学者只有2人左右,说明我国图情学者对大多数智库的吸引力不足,与智库的产学研合作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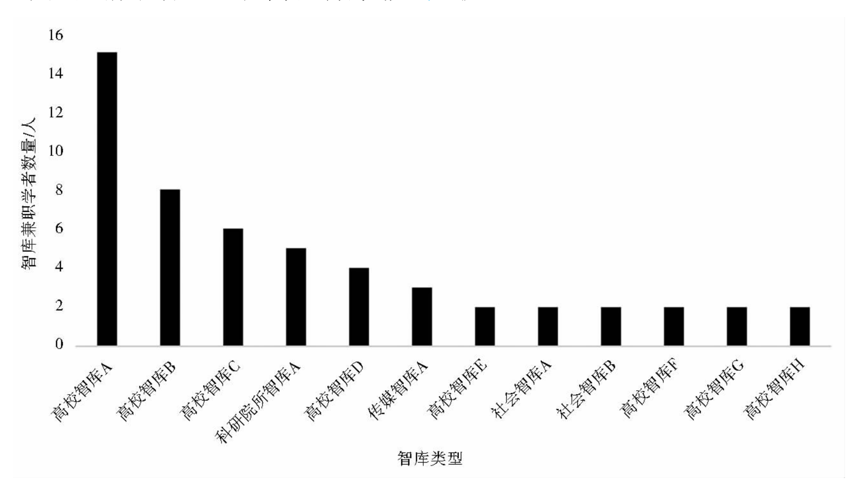


图3　智库兼职的中国图情学者数量及分布

4.2　参与智库活动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的影响

通过对比未参与智库活动、参与智库活动、智库兼职的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情况发现,3组学者的中文期刊发文量均值都超过120篇,且80%以上的文章发表在选定期刊上,学者在选定期刊上发文的合作者人数超过60人。智库兼职的学者学术成果情况均优于参与智库活动的学者,参与智库活动的学者学术成果情况又优于未参与智库活动的学者(见图4),且方差分析发现3组学者学术成果的数量、质量和合作的均值都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可见,参与智库活动对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有促进作用,且智库兼职对其促进作用更大,即参与智库活动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的数量、质量和合作均有正向影响,支持了假设H1、H2、H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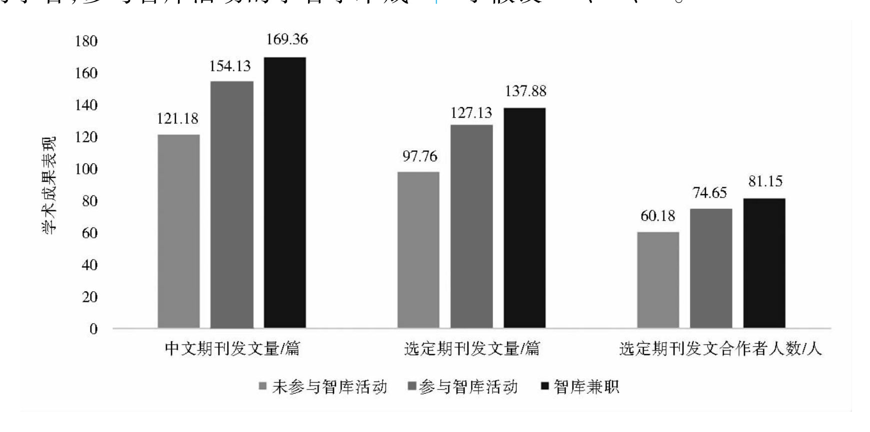


图4　参与智库活动的学者学术成果情况

4.2.1　对学术成果数量的影响

根据模型Ⅰ分析发现,智库兼职($p<0.1$)和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p<0.05$)显著提高了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部分支持假设H1;学术年龄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数量的影响显著($p<0.01$),即学术年龄越大(老年组学者),发文量越多。为了控制学术年龄对学术成果的影响,本研究将样本学者按照学术年龄进行分组。根据调研,中国图情学者的本科毕业年龄平均为22岁,所以本研究把学术年龄的起点定为22岁。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分类[51],本研究把学者的学术年龄分为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其中,青年组为学术年龄小于等于22岁的学者群体,老年组为学

术年龄大于等于 38 岁的学者群体,中年组为其余学者。研究发现,分组后学术年龄对青年组($p < 0.05$)和老年组($p < 0.01$)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有显著影响,而对中年组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影响不显著,但中年组学者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增加其学术成果数量($p < 0.1$)。样本中青年组无学者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和参与政府决策,说明参与政府的智库活动需要学者具有丰富的阅历和学术经验,所以我国青年组学者很难参与政府的智库活动;老年组无女性学者,而且性别和组织支持度对于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影响不显著,如表 4 所示:

表 4 参与智库活动对各学术年龄组学者学术成果数量的影响

变量	学术成果数量			
	所有样本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任职学会委员	-1.384	-3.379	7.264	-4.336
	(4.313)	(8.341)	(7.875)	(5.267)
智库兼职	9.793 *	4.674	4.227	25.92
	(5.059)	(5.728)	(4.745)	(15.31)
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	40.33 **	0	37.65 *	22.21
	(15.95)	(.)	(22.14)	(25.82)
参与政府决策	0.747	0	2.963	14.76
	(9.642)	(.)	(10.73)	(19.27)
学术年龄	3.796 ***	5.003 **	3.980	15.56 ***
	(0.831)	(2.044)	(2.457)	(4.363)
女性	3.136	15.17	8.319	0
	(14.87)	(20.89)	(20.03)	(.)
组织支持度	1.317	-0.714	1.046	3.878
	(1.168)	(1.270)	(1.843)	(2.891)
观测值	100	28	47	25

注: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值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4.2.2 对学术成果质量的影响

根据模型Ⅰ分析发现,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提升学者的学术成果质量($p < 0.05$),部分支持假设 H2。进一步细分到各学术年龄组发现,中年组学者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提升其学术成果质量($p < 0.05$),并且每多任职一项教育部专业委员,10 年内在选定期刊上的发文量可以增加 33 篇,而青年组和老年组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青年组学者的学术水平正处于起步阶段,较少在高质量的选定期刊上发表文章,而老年组学者著作丰硕,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质量影响不大。根据模型Ⅰ分析还发现,学术年龄是影响学者学术成果质量的显著因素,学者的学术年龄每增加 1 岁,10 年内在选定期刊上发文增加 3 篇;学术年龄对青中老 3 组学者的学术成果质量均有显著影响($p < 0.05$),说明分组后的学术年龄可以进一步控制对学术成果质量的影响。另外,女性和组织支持度对学者的学术成果质量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关系不显著,如表 5 所示:

表 5 参与智库活动对各学术年龄组学者学术成果质量的影响

变量	学术成果质量			
	所有样本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任职学会委员	-1.966	-0.876	3.641	-4.414
	(3.220)	(7.671)	(4.873)	(4.672)
智库兼职	4.747	-6.364	2.827	15.08
	(4.227)	(5.503)	(3.723)	(11.39)
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	33.49 **	0	33.23 **	22.49
	(12.92)	(.)	(15.19)	(20.86)
参与政府决策	1.344	0	2.747	12.58
	(7.884)	(.)	(8.233)	(14.98)
学术年龄	3.154 ***	4.410 **	3.895 **	12.27 **
	(0.809)	(1.758)	(1.848)	(4.650)
女性	13.63	12.44	16.76	0
	(14.58)	(22.93)	(18.09)	(.)
组织支持度	1.657	0.435	2.230	1.582
	(1.024)	(1.189)	(1.550)	(2.624)
观测值	100	28	47	25

根据模型Ⅱ分析发现,中国图情学者每增加一个智库兼职,其当年及之后 3 年内的学术成果质量均会受到正向影响,即在选定期刊上的发文量会增加 4 篇左右,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正向影响将减弱(见表 6 第 2 列);学者每增加一个智库兼职,其当年及之后 3 年内进行学术合作后的学术成果质量均会受到正向影响,即在选定期刊上的发文量会增加 1 篇左右(见表 6 第 3 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正向影响也将减弱,但上述现象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学者参与智库活动产生的研究成果形式多种多样,且产出的众多研究报告直接面向决策者,因而没有显著增加其在选定期刊上的发文量。

4.2.3 对学术成果合作的影响

根据模型Ⅰ分析发现,智库兼职可以显著增加学者的学术成果合作($p < 0.01$),部分支持了假设 H3。细分到各学术年龄组,中年组学者智库兼职对增强其学术成果合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 < 0.01$),而青年组学者、老年组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合作的影响不显著。相较于对学术成果产出的显著影响,

表 6　智库兼职对学者学术成果质量影响

变量	选定期刊发文量	合作者加权发文量
智库兼职数量	4.847	1.621
	(5.505)	(2.766)
滞后 1 年智库兼职数量	4.619	1.488
	(5.265)	(2.670)
滞后 2 年智库兼职数量	4.493	1.383
	(5.003)	(2.585)
滞后 3 年智库兼职数量	4.552	1.339
	(4.889)	(2.594)
是否已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否已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3 001	3 001

整体来看，学术年龄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合作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青年组学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 < 0.05$)，说明青年组学者在学术生涯初期，希望与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合作来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而中老年组学者经过长期的学术合作后，其合作群体相对稳定。组织支持对于学者，特别是对中年组学者的学术成果合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 < 0.1$)，说明学者所在单位的智库机构越多，其学术成果合作者人数越多，如表 7 所示：

表 7　参与智库活动对各学术年龄组学者的学术成果合作影响

变量	学术成果合作者人数			
	所有样本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任职学会委员	−0.424	1.503	1.430	−0.232
	(1.341)	(4.833)	(1.466)	(1.809)
智库兼职	6.391 ***	−1.025	6.532 ***	7.620
	(1.878)	(3.799)	(2.018)	(6.256)
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	9.269	0	12.79	6.514
	(6.860)	(.)	(8.455)	(12.85)
参与政府决策	−1.263	0	5.881	−6.143
	(4.463)	(.)	(4.391)	(6.546)
学术年龄	0.634	3.129 **	1.542	3.459
	(0.387)	(1.495)	(0.961)	(2.503)
女性	2.901	4.761	−0.790	0
	(7.730)	(18.87)	(8.391)	(.)
组织支持度	1.037 *	0.399	1.380 *	1.464
	(0.550)	(1.053)	(0.781)	(1.075)
观测值	100	28	47	25

根据模型Ⅱ分析发现，中国图情学者每增加一个智库兼职，其在参与智库活动的当年及之后 3 年内，累计合作者增加 4 人左右($p < 0.05$)，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加趋势还在增强(见表 8)。可见，智库兼职可以扩大学者的学术合作网络，有效增强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

表 8　智库兼职对学者学术成果合作影响

变量	学术成果合作者人数			
智库兼职数量	4.440 **			
	(1.947)			
滞后 1 年智库兼职数量		4.573 **		
		(1.930)		
滞后 2 年智库兼职数量			4.871 **	
			(1.916)	
滞后 3 年智库兼职数量				5.216 ***
				(1.937)
是否已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否已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 001	2 901	2 801	2 701

5　讨论与启示

5.1　讨论

本研究发现，任职学会委员和智库兼职是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最多的智库活动形式，且兼职的智库主要是依托教育部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和高校成立的、具有咨询和学术交流功能的高校智库，说明中国图情学者参与智库活动主要是学术交流。通过调研在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1] 中位居世界前百的 8 家中国智库，发现鲜有中国图情学者参与其活动，说明中国图情学者很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这个现象与宋忠惠等提出的在智库政策咨询活动中"图情领域鲜有作为，缺乏深入探索和引领潮流的魄力"观点相一致[4]。而美国顶级经济学家集中兼职于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等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独立智库，他们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9]。因此，建议我国图情学者要积极兼职党政智库和社会智库，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主动参与智库的决策咨询研究，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和决策话语权。

本研究发现，参与不同形式的智库活动对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影响作用不同。如智库兼职和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提高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提升其学术成果质量，智库兼职可以显著增强其学术成果合作，但任职学会委员、参与政府决策对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图情学者尚未充分利用各类智库活动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因此，建议我国图情学者要广泛参与各类形式的智库活动，以促进学术成果

转化为决策咨询产品,从而提升其学术成果的产出效果。

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学术年龄的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的影响不同。如智库兼职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图情中年组学者的学术成果合作,说明不同学术年龄的学者会表现出不同的学术合作策略[52];中年组学者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可以显著提高其学术成果数量,这印证了秦佳良采用回归模型发现学术开放性对不同学术年龄学者影响力的边际效应不同[53]。因此,建议我国图情学者在不同的学术年龄组要参与合适的智库活动形式,以促进其学术成果在政府、业界以及全社会的广泛传播。

5.2 理论价值

笔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综合研究参与智库活动对中国图情学者学术成果的影响,丰富了产学研合作对学术成果影响研究。已有研究集中于学术创业对学术成果的影响[25-26],而本研究从产学研合作新视角探讨参与智库活动对学术成果的影响。现有的智库研究多以案例研究、理论研究等定性方法为主,如 A. Naveed 等通过半结构访谈和案例研究探讨了参与各种形式的智库活动对学者学术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的影响作用[54],鲜有应用定量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笔者基于中国图情学者的面板数据,采用回归分析和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定量方法,探析了参与智库活动对学者学术成果的影响。该研究成果不仅为现有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还揭示了被学术年龄掩盖的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影响的真相。

5.3 实践价值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警示作用,因为尽管任职教育部专业委员和智库兼职对中国图情学者的学术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任职学会委员会减少其学术成果数量、降低学术成果质量、减弱学术合作。因此,建议我国图情学者要参与合适的智库活动形式,不断提高其学术成果产出和加强学术合作,从而增强其社会影响力和决策话语权。

本研究还发现,中年组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有显著影响,而青年老年组学者参与智库活动对其学术成果的影响不明显。因此,建议高校及智库在人才引进和研究团队组建时,要兼顾学者的学术年龄和参与智库活动形式的匹配度,充分发挥各学术年龄组学者的决策咨询作用,从而提高其学术成果的高效产出。此外,研究发现组织支持可以显著增强学者的学术成果合作,建议高校及智库要加强各种具有咨询功能的研究机构建设,推动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参与智库的研究议题,以提升中国图情学者的学科辐射力和专业影响力。

5.4 反思

由于国内智库的学术成果形式多样化和研究样本信息获取的限制,笔者没有收集英文期刊论文、中文专著和报告等类型的学术成果,这可能会影响本文结论的普适性。后续研究将优化研究样本的选取方法,扩大样本数量,增加各种学术成果,并应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等方法,对学者参与智库的具体活动内容与其学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等展开相关性的深入研究,更科学更客观地探究参与智库活动对学者学术成果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MCGANN J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21.
[2] GARY B.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what is it? how do we get it? [M]// World Scientific reference on Asia-Pacific trade policie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20: 719-736.
[3] 聚智聚力,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EB/OL]. [2022-05-26]. https://news.gmw.cn/2022-05/26/content_35764138.htm.
[4] 宋忠惠,郑军卫. 图书情报类期刊中的智库相关研究评价与分析[J]. 情报杂志,2016,35(8):145-150.
[5] 申静,蔡文君,毕煜. 智库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前沿[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12):30-38.
[6] 王世伟. 试析情报工作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以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为例[J]. 情报资料工作,2011,32 (2):92-96.
[7] HONG W. Exploring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hink tanks [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Ottawa: Clausius Scientific Press,2019:18-23.
[8] 智库:国家的不可或缺的"外脑"[EB/OL]. [2022-06-10]. https://www.sinoss.net/2014/0508/50049.html.
[9] 郭华桥. 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模式与困境突围——基于"学者"使命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2014,30 (5):50-57.
[10] BRATERSKY A. Think tanks during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J]. USA & Canada: economics, politics, culture,2020,50(6): 92-108.
[11] 毛丹. 多元协同视角下图书馆学会参与社会智库服务策略研究[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7):95-96,99.
[12] 仇�熙,张静一. 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跟踪与管理初探[J]. 科研管理,2017,38(S1):695-699.
[13] 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EB/OL]. [2022-06-1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2557/s3103/

202012/t20201215_505588. html.
[14] 曾文. 数字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评价导向——以数字学术成果的评价问题为中心[J]. 图书馆论坛,2021,41(2):46－55.
[15] 姚乐野,王阿陶. 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分析——基于“985”高校在 Web of Science 期刊发文引文的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1):111－120.
[16] 严炜炜,温馨,曹灿瑜. 学术社交网络中 iSchool 高影响力科研成果特征分析[J]. 情报科学,2021,39(7):23－29,37.
[17] 张琳,杜会英,尚媛媛,等. 性别视角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的成果产出与影响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1,11(3):110－120.
[18] ZHANG M, ZHANG G, LIU Y, et al. Scientists' gender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llabo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20, 14(4): 101068.
[19] TRUONG H T, LE H M, DO D A, et al. Impact of governance factors over lecturer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an empirical evidence[J]. Education sciences, 2021, 11(9): 553.
[20] LERNER J Y. Getting the message across: evaluating think tank influence in Congress[J]. Public choice, 2018, 175(3): 347－366.
[21] CHRISTENSEN J, HOLST C. How do advocacy think tanks relate to academic knowledge? the case of Norway[J].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20, 43(3): 223－239.
[22] WEAVER R K.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J].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89, 22(3): 563－578.
[23] PLANELLS-ARTIGOT E, ORTIGOSA-BLANCh A, MARTÍ-SÁNCHEZ M. Bridging fiel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esence of think tank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1, 162: 120377.
[24] 黄胜杰,张毅. 我国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模式及其网络特性探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20(6):30－33.
[25] VAN LOOY B, RANGA M, CALLAERT J, et al. Combining entrepreneurial and scientific performance in academia: towards a compounded and reciprocal Matthew-Effect[J]. Research policy, 2004, 33(3): 425－441.
[26] BUENSTORF G. Is commercialization good or bad for science?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rom the max planck society[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2): 281－292.
[27] 聂峰英,孙明杰,张海燕,等. 国际比较视域下科技智库多主体运营模式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10):74－80.
[28] 宋鹭,安怡宁. 世界顶级智库如何开展和保障高质量研究——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为例[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6(1):77－83.
[29] 高浩然.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智库活动——以美国经济学界为例[D]. 北京:北京大学, 2020.
[30] FEDDERKE J W, GOLDSCHMIDT M. Does massive funding support of researchers work?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South African research chair funding initiative[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2): 467－482.
[31] 马缨. 行政职务对我国科研人员论文发表的影响[J]. 科学学研究,2017,35(11):1614－1622.
[32] MCGANN J G. Global trends and transitions in think tanks, politic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age of policy dilemmas and disruptions[M]//Consensus or conflict? Singapore: Springer, 2021: 179－190.
[33] PAUTZ H. Revisiting the think-tank phenomenon[J].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11, 26(4): 419－435.
[34] 周湘智. 主管部门介入生产:智库成果质量控制的有效模式[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6(5):8－13.
[35] MENDIZABAL E. From perception to objectivity: how think tanks' search for credibility may lead to a more rigorous assessment of research quality[C]//ERIKA K M, ROBERT T, MATTHEW L, et. al. Transforming research excellence. Cape Town: African minds, 2020:178－199.
[36] 王洪才,毛芳才. 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96 (1):122－130.
[37] JIA R, NIE H, XIAO W. Power and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cademi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9, 47(4): 792－805.
[38] MCCRAIN J. Revolving door lobbyists and the value of congressional staff connection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8,80(4): 1369－1383.
[39] CAMPOS R, LEON F, MCQUILLIN B. Lost in the storm: the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that went missing in murricane ISSAC[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10):995－1018.
[40] 王战平,朱宸良,汪玲,等. 生态系统视角下虚拟学术社区科研人员合作影响因素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4):119－129,98.
[41] 郑荣,唐伟航,杨竞雄,等. 多元主体协同视角下的智库影响力提升机制研究[J]. 情报科学,2020,38(9):63－68.
[42] ZHAO D, STROTMANN A. Information science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Web: an enriched 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59(6): 916－937.
[43] 邱均平,周春雷. 发文量和 h 指数结合的高影响力作者评选方法研究——以图书情报学为例的实证分析[J]. 图书馆论坛, 2008,28(6):44－49.
[44] BOJKO M M, KNAPIŃSKA A, TOMCZYŃSKA A.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Poland[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21, 28(4): 486－506.
[45] UNESC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der: an international report[R].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7.
[46] 张晓娜. 基于中文核心期刊的图书情报学科学者的学术年龄研究[J]. 情报探索,2019,33(1):62－66.

[47] ANDREA B, PAOLA B, LUCA S. The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universities. a multilevel and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n European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21,15(2):101129.
[48] LARIVIÈRE V, NI C, GINGRAS Y, et al. Bibliometrics: global gender disparities in science[J]. Nature, 2013, 504(7479): 211 –213.
[49] CARD D, ASHENFELTER O. Using the longitudinal structure of earning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raining program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67(4): 648 –660.
[50]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1637 –1667.
[5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day 2012: ageing and health: toolkit for event organizers[R/OL]. [2022 –07 –01]. https://apps. who. int/iris/handle/10665/70840.
[52] PETERSEN A M.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weak, strong, and super ties in scientific career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34): E4671 –E4680.
[53] 秦佳良,贺明华. 学者开放性和学术影响力[J]. 科学学研究, 2020,38(5):769 –778,796.
[54] NAVEED A, SULERI A. Making 'impact factor' impactful: universities, think tanks and policy research in Pakistan[R]. Islamaba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Institute, 2022.

作者贡献说明:
申静:选题并提出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框架,修改论文;
陈晓龙:采集、清洗和分析数据,撰写论文初稿。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ng in Think Tank Activities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holars

Shen Jing Chen Xiaolo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hinese scholar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are the main force of studying think tank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S scholars' participation in think tank activities on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study and strengthening the think tanks'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 Descriptive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ulti-perio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ID)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S scholars' participation in think tank activities on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Result/Co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forms of Chinese LIS scholars' participation in think tank activities include taking office in society, affiliating in a think tank, severing as a disciplin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ink tank development forums. In addition to participating in think tank development forums, the first two forms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quantity of Chinese LIS scholars can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affiliating in a think tank and severing as a disciplin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ffiliating in a think tank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operati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quality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severing as a disciplin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in think tank activiti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holar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middle-aged group.

Keywords: think tank activities academic achievements Chinese LIS scholars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multi-perio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